



全国政协常委、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钱学明:

# 精准有序产业转移 构建东西互补协作新格局



钱学明

证券时报两会报道组

实施国家产业转移提升工程,是中央立足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也是筑牢我国实体经济根基、激活经济内生增长潜能、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举措。近日,全国政协常委、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钱学明接受证券时报专访时指出,国家产业转移提升工程是统筹发展与安全、促进区域协调、激活经济潜能的关键之举,产业转移绝非简单的空间搬迁,需通过系统性政策创新破除转移堵点、理顺区域利

益分配,推动产业在梯度转移中实现绿色化、智能化升级,同时紧抓西部绿电、“东数西算”、科技创新三大机遇,以人工智能赋能培育新质生产力,最终形成东中西部优势互补、共建共享的产业协作新格局。

在钱学明看来,国家产业转移提升工程的战略意义,集中体现在三大核心维度。

第一,这是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关键抓手。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深刻调整,我国关键产业及产业链核心环节过度集中于东部沿海,部分产业加速“出海”,给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带来挑战,推动产业有序转移能够有效保持国内制造业合理比重,筑牢实体经济根基,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与国家安全格局。

第二,这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我国中西部交通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清洁能源基地、“东数西算”工程稳步推进,产业转移既能充分释放中西部资源禀赋优势,也能推动产业在空间重构中实现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第三,这是激活经济潜在动能的核心举措。我国近3亿尚未实现市民化的农业转移人口绝大多数来自中西部,产业有序转移能够推动劳动力就近就业与市民化,深度释放中西部新型城镇化、居民消费等领域的增长潜力。

针对当前产业转移中存在的转出地动力不足、承接地要素保障受限等瓶颈,钱学

明提出,必须以全国一盘棋思维推动关键政策创新。要优化区域考核评价体系,适当降低东部地区GDP、税收等考核权重,更突出科技创新、转型升级等高质量发展指标,对东部因产业转移减少的相关指标在国家统计层面给予基数核减,从根源上调动转出地积极性。

同时,要推动要素指标跨区域灵活配置,根据产业布局合理分配碳排放指标,重点强化强度考核,适当增加西部地区用地、碳排放等要素指标,出台要素指标随产业项目等量或减量转移政策,让企业在转移中提升“含绿量”“含新量”。此外,还要创新转移企业原有土地退出和地价形成机制,制定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奖励政策,为企业搬迁转移提供核心资金支持,同时激励东部地区推动产业跨省转移。

破解“承接地热、转出地冷”的行业困境,核心在于健全转出地与承接地的利益共享机制。钱学明建议,要探索基于产业链贡献度的财税分成制度,对产业转移形成的GDP、投资等增量经济指标,试点东西部省份先行协商再行划分,实现国家统筹与跨区域分配相结合;深化省际交界区域合作,推广多样化的东西部共建产业园区开发模式,深入发展“反向飞地”“双向飞地”等产业转移新模式,支持西部承接地在东部转出地建设“科创飞地”,打造“研发设计在转出地、生产制造在承接地”的长效协作格局。

他特别强调,产业转移绝非盲目搬迁,必须坚持“精准有序”的核心原则。国家层面需完善相关产业指导目录,加强对产业梯度转移的分类指导,针对不同产业类型实施差异化转移引导策略,推动产业在转移中完成技术升级、设备更新和工艺换代。同时,产业转移要与乡村振兴战略深度融合,通过“产业跟着打工人口走”,推动中西部县域立足自身定位以“一县一业”培育主导产业,围绕产业链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创造更多稳定就业岗位,同步完善县城公共服务配套,实现产业发展与民生改善的双赢。

在人工智能赋能、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时代背景下,钱学明提出,产业转移不仅能实现转型升级,更能借助技术革新实现跨越式发展。他指出,东部企业需重点把握三大产业转移新机遇:

一是西部绿电机遇,西部地区丰富的清洁能源与完善的碳管理政策,能帮助转移企业有效应对国际“碳关税”壁垒,降低绿色转型成本。

二是“东数西算”机遇,企业可依托相关工程,借助数字经济、绿色技术实现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在降本增效中拓展全新市场。

三是科技创新机遇,西部地区正立足自身禀赋培育特色先进制造业集群,形成了显著的成本优势,为产业转移集聚提供了优质载体。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景虹:

# 解决数据孤岛与人才断层难题 助力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



李景虹

证券时报两会报道组

人工智能正从通用能力走向专业赋能,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驱动产业升级的关键引擎。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景虹在接受证券时报

记者专访时表示,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既要以高质量行业数据筑牢产业底座,也要以系统性改革打通教育、科技、人才循环,双轮驱动我国抢占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制高点。

当前,我国“人工智能+”行动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大模型技术快速迭代,但产业落地仍面临“通用有余、专业不足”的困境。李景虹在调研中发现,垂直领域大模型需要依托行业特有知识、实验数据与场景反馈持续迭代,而我国高质量专业数据供给不足、数据治理规则不健全、数据共享机制不畅,已成为制约“人工智能+”走深走实的关键变量。

“行业大模型的核心竞争力,源于对高质量专业数据的深度训练。”李景虹直言,当前我国行业数据建设面临多重挑战。公共资助科研数据开放共享水平不高,创新主体获取成本高、效率低;关键行业基础数据积累不足,化工、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长期依赖国外商业数据库,数据孤岛现象普遍;高价值数据生成依赖专业设施,我国数据生产型基础设施仍处起步阶段;场景数据回流机制

不清晰,企业本地化部署导致模型难以形成应用—反馈—优化的数据飞轮。

针对这些痛点,李景虹建议将行业数据资源建设提升到与技术创新、硬件投入同等重要的战略高度,构建分类施策、共建共享、安全可控的行业数据新生态。他提出,优先在生物医药、高端材料、智能制造等数据价值密度高的行业开展试点,制定行业高质量数据发展指南;布局行业级“数据工场”,建设自动化实验室、数字孪生平台等数据生产基础设施,依托隐私计算、联邦学习探索数据共建共享池;强化公共科研数据开放共享,将数据提交与开放情况纳入科研项目验收评价;明确场景数据合规使用边界,鼓励云端服务模式,让数据安全流通、价值高效回流。

数据是人工智能的“养料”,人才则是驱动技术创新的核心。在李景虹看来,人工智能的竞争本质是国家创新体系效能的竞争,是基础研究、人才培养与产业转化速度的全方位较量。随着人工智能进入纵深发展阶段,传统学科划分、标准化人才培养模式已难以适配前道需求,教育、科技、人才三者割裂

推进的问题日益凸显。

“推进‘人工智能+’,既要解决数据‘有没有、好不好、通不通’的基础问题,更要破解人才‘够不够、用不用、融不融’的长远难题。”李景虹认为,当前我国创新体系开放性不足,科技评价“重数量轻质量”、产学研协同存在“成果转化断层”,制约了人工智能领域原创突破与产业落地。他建议以系统性思维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为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具体而言,一是夯实数据底座,由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科学与工程基础数据平台,推动关键领域数据标准化与开放共享,破解数据孤岛;二是推动融合育人,在高校布局“AI+X”交叉学科与交叉学院,动态调整专业设置,构建贯通式AI人才培养链条;三是深化评价改革,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产业实效为导向的评价体系,为科研人员减负松绑;四是强化协同攻坚,支持龙头企业与高校牵头组建新型创新联合体,健全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机制,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达尔文之海”。

# 如何破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结构性矛盾?

证券时报记者 李颖超

常说金融要服务实体经济,但实际上资金还是偏爱大企业,有潜力的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急需转型的传统企业却“喊渴”,这种“旱涝不均”的局面,到底怎么才能打破?怎样才能让资金真正流向最需要它的地方?

——证券时报网友

当资金习惯性地涌向成熟企业的“安全区”,那些有潜力、有技术却还“嗷嗷待哺”的创新型中小企业,该如何敲开融资的大门,这正是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必须要面对的考题。

打通资金流向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等关键领域的“最后一公里”,也是今年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建言献策的重点。从拓宽私募股权退出渠道,到创新投贷联动机制,再到培育并购基金与高收益债市场,一系列针对性建议直指痛点,为构建更加多元化、多层次、更具韧性的金融服务体系提供

了解思路。

## 为耐心资本打开通道

私募股权基金是科技创新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之一,但在实践中,这类基金也面临自身资金循环不畅的情况。

全国政协委员、中泰证券总经理冯艺东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随着传统退出渠道IPO节奏放缓,大量项目投资期限届满的私募股权基金面临较为严峻的转让与退出困境,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私募股权基金“投资—转让—退出—再投资”的良性循环。

“由于缺乏公开透明的私募股权基金份额交易的二级市场,私募股权基金份额交易效率低下。”冯艺东建议,可在海南设立全国性、市场化运作的私募股权基金份额交易所。一是完善顶层设计,强化统筹协调;二是设立私募股权基金份额二级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三是制定信息披露制度,加强信息披露监管;四是明确两阶段实施路径,培育良好市场生态;五是借鉴股票交易市场成熟

经验,严厉打击市场违法违规行为。

## 打破投贷壁垒

如果说为私募股权基金疏通“退出渠道”,解决的是资金“怎么退”的问题,那么如何让占据金融市场主导地位的银行信贷资金“愿意投”,则是另一道必须跨越的难关。

科创企业普遍具有轻资产、前期投入大、盈利周期长等特点,而传统银行信贷的风控模式则更侧重于抵押物价值和历史经营表现,两者在风险识别维度上存在一定差异。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证监局原局长贾文勤建议,完善投贷联动机制,引导金融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领域。贾文勤认为,开展投贷联动业务对畅通“科技—产业—金融”循环具有重要意义,2016年启动试点以来,投贷联动已从概念探索步入实践深耕阶段。从现实情况来看,尽管投贷联动试点已开展多年,但与银行与投资机构之间“握手”但“没交心”的局面仍有改善空间。为从机制上打破这种隔阂,贾文勤建议,建立健全业务平台和合作机制,建立投贷联动业务标准化合作平台,推动私募基金管理人通过标准化接口与银行共享关键信息。建立常态化交流与培训机制,促进银行与私募基金管理人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关系。健全银

行与投资机构收益分享机制,明确银行通过认股权等参与超额收益分配的权利。

## 构建全周期金融服务体系

除了依靠银行信贷的间接融资创新,做大做强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渠道,同样是破解结构性矛盾的关键一环。产业升级不仅需要“投早投小”的耐心资本,也需要支持企业整合重组的并购力量,以及匹配更高风险的债券融资。

全国政协委员、中信资本董事长张懿宸建议,应持续完善并购基金各项政策,提升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为充分释放并购基金活力,张懿宸提出,监管部门可根据业务类型与并购属性,适当放宽业绩承诺、对赌、同业竞争、关联交易等方面的要求,进一步鼓励持有优质产业资源的并购基金,与产业上下游上市公司开展并购重组。

谈及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一些挑战时,全国人大代表、启阳集团董事长王麒也建议,破解融资堵点要推动金融机构创新信贷产品,鼓励地方政府设立融资担保风险补偿基金。

破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结构性矛盾,归根结底就一句话:让资金流向它最该去的地方。从疏通退出渠道到创新投贷联动,从并购重组到高收益债——多元融资渠道的每一次拓宽,都是在为创新的中小企业多开一扇门。

经济、创新、民生领域的亮眼成就,是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一步一脚印地干出来的。

# 良言如春,良策成林

证券时报两会报道组

3月5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正式开幕。这是一场瑞雪后的北京,走在外面仿佛可以听见冷空气清冽的味道;积雪的缘故,会场周遭的声音同以往开会相比小了一些。但会场内的热烈从人民大会堂一直延续到代表团驻地。

“《政府工作报告》专门提到了要‘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说‘策源地’就意味着不是原来意义上靠存量、靠惯性来发展。”在人民大会堂内,到场列席听会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坚就着报告“出炉”的热乎劲儿,谈了一点他的感受:今年是“十五五”时期的第一年,要为往后的发展打基础,因此《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诸如“策源地”“完善适应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促进就业的措施”这样的关键词句,都指向问题思考深度和层次的显著变化。

问题深一度,政策先一步,归根结底围绕的是“高质量发展”这一时代主题。走出人民大会堂,在距离不到两公里的北京饭店,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海市代表团(下称“上海代表团”)各位代表将上午听会的澎湃思潮转化为下午全体会议的审议发言。

经济、创新、民生领域的亮眼成就,是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一步一脚印地干出来的。

“我国高质量发展振奋人心,2025年面对多年少有的外部冲击挑战和国内两难问题交织叠加的复杂严峻形势,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发展向新向好,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任务顺利完成,‘十四五’圆满收官,这是很不平凡的一年。”上海代表团副团长、上海市市长龚正感叹道。

越是外部环境风高浪急,越能显示我国的战略自信和坚定意志,越能体味当前成绩的弥足珍贵。

一位到场参会的官员提到这样一个细节:去年以来,不少外宾来访,大家谈到国际经贸形势时,都对我国表现出高度的钦佩。中国在这场应战中赢得了全球的尊重和信任,我国日益成为世界稳定发展的关键因素。

发展之高质量,抽象成数据来看,是我国社会研发投入强度提高至2.8%,首次超过OECD国家平均水平;是企业成为研发投入主体,研发占比达75%以上;是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比首次超过10%、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比达17.1%、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比达36.8%……

而凝练成这些抽象数据的,是背后一个个具体的人。

“在2024年胡润U25中国创业先锋榜上,苏睿是榜单中最年轻的创业者;吴迪2020年成立影眸科技公司,已获得社会融资超亿元。”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科技大学常务副校长印杰谈起自己学校的学生,像一位自豪的家长。

当然,好成绩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教育是国之大计,有了人才,才有未来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而让年轻的创新群体真正释放创业活力,第一站离不开学校顺畅的机制对接。

印杰认为,高科技创业已成为国家经济的主要增长极,大学应建立符合自身特点和市场规模、覆盖老师和学生的创业体系,应将创业教育和创业服务融入学生培养的全过程,培养一批高科技创业者。

证券时报记者在现场进一步追问未来五年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点时,印杰娓娓道来。

“高科技创业者中很大一批事实上都跟大学、科研院所有关系,所以我们还是要重视,特别是现阶段人工智能、具身智能,很多都是小孩子做!像我们这样的年龄已经做不了了。”谈及此,印杰的语调明显高了。他说,年轻人的创造力是无限的,学校要做的,就是创造科研、科研成果转化的环境,让他们能脱颖而出。而一旦开始创业,就不是大学所擅长的范畴了,就需要引入更多社会资源,包括投融资资金等,让成果更好地推向市场。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这个春天,良言如约在此汇聚成为良策,我们仍锚定高质量发展的既定目标,继续赶往下一个五年。

两会特写

